

# 1 二三论

这里 我们主要是讨论“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的关系 故称为“二三论”。

十几年前 有人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他们认为 世界不是“一分为二” 而是“一分为三”的。如今又有人提出这样的命题 世界是“一分为多”的。其实，一分为三已经含有一分为多的意思了。

一分为三这个命题对吗？没有人肯定，也没有人否定。在听其自生自灭。

这有着它理论上的原因，因为它似乎要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这也有着政治上的原因 因为杨献珍同志过去提出过用“合二而一”来补充“一分为二”，遭到过严厉批判。后来虽然平了反，但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

我认为，一分为三能不能成立，不在这个提法

本身，主要在于我们把它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如果把它放在对事物的性质的分析上，放在最终层次的分析上，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事物最终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点已经无须论证。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事物的存在的状态这个层次上，那么，一分为三就不仅能够存在，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哲学概括。

也就是说，一分为二是事物性质（特别是最终性质）层次的哲学分析，一分为三是事物存在状态层次的哲学分析。分清了不同的层次以后，两者就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这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会有极大的帮助。

你看，在现实世界中，在直观上，一切都是一分为三的。从空间上说，有上、中、下；左、中、右；大、中、小。从时间上说，有过去、现在、未来。从颜色上说，有白、灰、黑。从数学上说，有正数，负数，还有 0 这个不正不负的数。从人称上说，有我、你、他。从物质的结构说，有电子（带负电）、中子（不带电）、质子（带正电）。从政治来说，有敌、友、我。从人群来说，有先进、中间、落后。从经济来说，有宏观、中观、微观。从主体来说，有国家、集体、个人。从产品来说，有优质的、合格的、劣质的……如此等等，千千万

万。总之，我们睁眼看到的净是一分为三的东西！

当然，一分为三的东西，再往下分，又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例如中对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是下，它们是上和下的对立；中对下来说，也可以认为是上，它们也是上和下的对立。纯粹的“现在”是不存在的，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当你说“这是现在”，就在此刻，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许多社会上的中间的东西是要分化的，或者整体倒向一边，或者这个“中间”自己分裂或分化了。

我们有这样的最终一分为二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承认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着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对事物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对运动状态的分析，就不是无足轻重而是至关重要的了。

如果我们在恰当的层次上，把握住了“一分为三”，并把它和一分为二正确地结合，我们会收到两方面的效果。

一方面，将有助于对事物的最终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事物的本质是一分为二的，而事物的现象是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的。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是通过分析事物的现象得来的，离开了事物的现象的分析，我们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将会架空。因此，恰当地运用一分为三，是正确地运用一分为二的重要方面。（顺便说一句，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也是一分为三的。一类可以称为“正象”从正面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一类是“歪象”歪曲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一类是“废象”对认识事物的本质没有什么作用。详见本书作者所著《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

另一方面，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总是要从实际出发的，因而也总是要从大现状出发的。而一分为三的分析，是对现状分析的最基本的哲学方法，更具有现实性，更能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更能从中得到分层次的、成系统的、可操作性的战略和策略。

我们都承认，毛泽东同志是阐述和运用一分为二的大师，但是他在制定和实施战略和策略的时候，总是贯穿了一分为三的精神。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社会力量分为三部分：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就是对敌人和敌对阶级，他也是一分为三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把地主阶级分为顽固派（投降派）、一般的地主、开明士绅这样的三个阶层。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一分为三也是在变化的。在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就是主要的敌人，到了抗日时期，这些人也可以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力量，尽管他们可能扰乱我们的战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同样运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他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是一分为三。对我国知识分子分析时，他认为，熟悉马克思主义并站稳了脚跟的是少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中间的即拥护马克思主义又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熟悉的程度又很不相同）的是多数，也是一分为三。到后来，他更把这种方法用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上，于是有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明确地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样的一分为三的方法，对制定战略和策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大家都是很明白的。即以“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例。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理论并不是否定一分为二，即没有否定当今的世界的最深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没有否定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但是他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就给了我们正确估量世界力量对比的钥匙，使我们有可能摆脱由于中苏对立而可能处于的孤立局面，并有可能利用各种矛盾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实现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战略和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近年来，苏联东欧的蜕变，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不复存在，世界出现了多极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运用一分为三的方法就更加显得

重要。不然我们将会错误地估计形势，甚至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

总之，本质层次上的一分为二和现象层次上的一分为三也是辩证的统一。不坚持一分为二，我们就会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不善于用一分为三的方法，我们也会脱离实际，也不能正确制定战略和策略，也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提出中介论，首要的目的就是要承认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之间的内在联系，承认和找出它们之间的中介。

## 2 层次论

### (一)

从思维的方式上，我们可以从特定的角度把人们所用的思维分成这样的两种方式：归结性思维和层次性思维。

所谓“归结性思维”是指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多次抽象，抽象一次，再抽象一次，直到归结为一个最后或最高的层次，方才罢休。这种思维常用的语言是“实质是……”、“关键是……”、“归根结底是……”，“全部的问题是……”等等。这种思维的特征也可以称为不含褒贬的‘上纲’思维。

我们常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近代中国的各种斗争说到底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问题，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后者实际上是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这也是归结性思维。

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思维和论述的方式。他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党是不能依了你们的，依了你们就是依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也是归结性的思维，他的结论是就最终实质和最后结果说的。如果是从直观状态说，“依了小资产阶级”怎么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呢？小资产阶级怎么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同了呢？这显然是一种“混淆”。但为了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用这样的思维和表达方法，是完全必要的。

在分析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这种归结性的思维常常被使用，这是为了发人深省而击一猛掌。应该说在这种场合下，这种思维方法和表达方法也是必要的。但后来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发展成为“无限上纲法”那是它走向了错误的极端。

归结性思维，有利于抓住事物的最终的本质，有利于划清大的界限，有利于我们把握大的方向，因而是在发动、动员、批判、斗争当中，最为需要的一种思维方法；因而也是革命时期最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也是和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较为配套的一种思维方法。正是这个原因，这种思维方法是我们过去用得最多的思维方法，以致形成了一种强大

的思维惯性，甚至把它当成了唯一的有深度的思维方法；即使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我们的工作中心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思维的惯性，还是一下子难以扭转过来。这就不能不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所谓“层次性思维”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更主要的是发现客观事物的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状态和内在联系，发现不同层次的存在和内在联系。

层次性思维类似系统论思维，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系统论更多的是研究事物的系统结构和运转的话，它主要的是用于工程方面，或工程思想（即把一件工作和一件事情当做工程来看），那么层次性思维仍然主要是用在认识论方面，它不仅把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作为不同的层次来研究，也把现象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把本质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搞清它们的层次状态。

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本来都是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发展起来的，而后又成为了“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决策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社会要继续发展，从这些现代科学成果中吸取一些营养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层次性思

维方法，就有助于完成这个任务。

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了执政的党，当我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这种层次性思维方法就显得极其重要了。这种思维有利于我们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有利于我们把认识和操作结合起来，有利于使全国各界各项工作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没有层次性思维，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进展，就会搞出乱子。

所以，在今天，在肯定归结性思维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有针对性地更加强调加强层次性思维。

我们可以把归结性思维和相关的理论称为“归结论”，也可以把层次性思维和相关的理论称为“层次论”。我们提倡的是归结论和层次论的结合，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思维状况和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更应强调要注意层次论。把归结论和层次论恰当地联结起来，这就是中介论的任务。

## （二）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国曾有个所谓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这场争论实际上由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做了结论。我们现在从哲学的角度再做一些研究。

一种意见说，在改革开放中，要敢于大胆实

践、大胆探索，不要总是一上来就先问一个姓资还是姓社（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意思是：总在姓什么的问题上打转转，那么就会陷于抽象的争论之中而影响实际工作，或弄清姓资还是姓社就不干了，或见到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就害怕了，那么改革开放就会迈不开步伐。

另一种意见说，我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不问姓资还是姓社，就很有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况且 1989 年的动乱说明了在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些发达的国家也确实一直对中国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的。改革开放是有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

从字面上看，这两种意见都是同样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它们的实际的含义和实际的针对性，问题更在于它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这里只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惊呼：改革开放的 10 多年来“私有化”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潜行”着；“三资”企业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发展，股份制的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等等都是表现。

这里涉及到的根本性问题是生产关系的看法。

把当代的生产关系分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样的两大体系，无疑是对的。但是，不足的是，在做了这样的归结性分析之后，没有再深入地做层次性分析；把两种生产关系都看成是铁板一块，既不认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可以再分析的，更不认为它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

生产关系是一个整体，但生产关系是一个有层次的整体，绝不象过去有的人理解的那样是“铁板一块”。有的经济学者指出，实际上它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基本性质的层次。

第二个层次：体制层次。

第三个层次：运行机制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最终和最高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可以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

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转形式。正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样，它们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又给予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巨大的反作用。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当然是重要的，它在生产关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是生产关系的灵魂。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要作用于生产力，必须通过体制层次和运行机制层次才能实现。所以，无论

从基本性质的表现来说，还是从基本性质作用的传导来说，体制层次、机制层次都是中介层次。中介层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层次。就一种生产关系来说，中介层次搞好了，和性质层次配套了，性质层次才能体现，它的作用才能发挥；反之，中介层次搞不好，生产关系的性质就不能很好地体现，性质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应该说，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中，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生产关系中的中介的层次是注意得很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忽略了。我们只强调社会主义根本性质上的优越性，但不明白怎样实现和发挥这种优越性，也就是不懂得通过中介层次的改善来做到这一点。性质层次和中介层次是不能长期背离的。要么改善中介层次适应性质层次，如中国的改革道路；要么由于中介层次的问题而导致性质层次的改变，如苏联、东欧发生的情况。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不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产生的，必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利用国家的权力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 迄今为止我们对“建立”这个概念的理解是片面的、残缺不全的。公有制的建立不是新的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派个军代表或政府代表，一宣布就完成了。不，这至多是一个开始。公有制的建

立、巩固、完善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确立、巩固、完善当然是就整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的，但就实际的工作内容来说，主要的工作是在中介这个层次进行的。

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初步建立的时候，人们是欢欣鼓舞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其实就是没有明确上述道理并坚持改革的结果。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开始建立的时候，就主体来说，只能采取国有制的形式，不仅是“国有”而且是“国营”因为它来不及采取别的形式。但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确立生产关系是有层次的思想，更没有中介的思想，于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就此止步了。不仅就此止步了，还把其他形式的生产关系尽量往这样的模式上转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最好形式。这在道理上似乎是说得很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然是全民所有，代表“全民”的就只能是国家，而我们的国家又是人民的国家，完全有资格代表。于是全民所有自然就转化为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的企业，自然又是应该由国家经营的，似乎不是国家经营，国家所有就落空了。于是国有自然又转化为国营。这就是过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模式或思路。

但“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往下一具体化就发生了问题：日常代表国家的只能是政府，于是国家所

有就成了政府所有；而政府是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于是政府所有又分割成了中央政府所有和地方政府所有；而中央政府又是由各部门组成的，于是中央政府所有又成了部门所有；一个部门管那么大的行业，必然又要做若干的划分，于是部门所有又变成了小部门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在理论和文件中看到的“全民所有”这个无比神圣的大字眼，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局长所有”、“处长所有”……全民都不感到自己的所有，而那个实际支配着国家财产的人，就是那个实际支配着资产的部长、局长、处长等也并不感到自己的所有。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全民所有的东西却无人感到自己所有，全民负责的东西却实际上是无人负责。

这种情况，这种铁板一块的生产关系概念，似乎使社会主义者陷于尴尬地位。要么坚持公有制而容忍僵化；要么追求活力而导致私有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是要有层次论的观念，要把生产关系分解为若干层次，而特别注意中介这个层次。

你看，毛病其实就发生在中介这个层次上！

毛泽东同志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就明确地讲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有不完善

的地方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地方，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但由于历史的实践的原因，他还没有来得及指出生产关系中中介层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近 10 多年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我们看清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常说，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统一的，而在一些人那里又总是统一不起来。在他们看来，两个基本点总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明白了生产关系中层次论的道理，也就懂得了两个基本点统一的哲学基础。这种统一是坚持基本性质和为坚持基本性质而必须改善和改进其实现形式的统一。不坚持基本性质，无所谓改善实现形式。不改善实现形式，基本性质也将不能体现，或者因为实现形式的问题而导致基本性质的不能坚持。这样来看，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 （三）

我们说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层次是中介层次，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们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介层次。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是如此，在世界的范围内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其基

本性质来说是根本对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是彼此绝缘的对立，而是辩证的对立，即有联系的对立。这种联系至少表现在：

1.两者都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即它们都处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如果一个在地球上，一个在火星上，这里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对立。

2.两者可以互相转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历史的总趋势。但是也不能排斥在某一个时期和某一个局部出现相反方向的转化。

3.两者的并存和竞争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现象。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生产关系不能不发生频繁的交往，以至互相渗透、影响等等。

要问：两种对立的制度何以能够处于一个统一体？何以能够互相转化？何以能够互相交往？答曰：主要赖以中介层次和中介体的存在。

中介层次和中介体本身也是很复杂的，它也分为若干的层次和若干的情况。中介论的全篇都是要说明这个问题的，故不可能在这里充分展开。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若干实例说明中介层次和中介体是如何起着联结两者的作用的。

例如货币，它最初是商品交换的中介物。没有